

中国人口变化与食物安全： 现实与出路

Population Change and Food Safety in China: Reality and Solutions

文/ 陆杰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引发世界范围内的一系列论争。

有关人地粮关系的纷争

自有历史记载以来，由于食物安全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因此食物安全成为了各类社会所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近几十年来，人类居住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口、耕地与粮食之间关系逐渐成为了人口资源环境领域的一个热点。尤其是随着人口规模、结构、分布等要素的变化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食物安全问题也超出了国家或者地区的关注范畴，正在成为全世界共同瞩目的重要议题。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曾经将食物安全界定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的食物。”毋庸置疑，我们从这个概念可以诠释食物安全的深刻内涵：一是食物安全保障的目标不仅是要维持人的生存，还必须维护人的健康；二是食物安全保障的对象是所有的人口，表明这一权利不因贫富贵贱而有别；三是食物安全保障的内容包括维持总体的食物供需平衡，并保证每个个体处于食物安全状态。

近20年来，中国食物安全随着转型的人口变化、逐年减少的耕地资源以及极端气候环境变化而引起了国际社会及国内政府决策者前所未有的关注，尤其是现阶段人口变化对中国食物安全的现状与趋势的影响，已经

引发了全球范围的一系列论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全球人口的迅速增长，人口、耕地与粮食之间关系成为了各国政府和学界研究人口资源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1950—1979年，全球人均耕地从8.5亩减少到4.8亩，减少接近一半，因而从现实看全球范围的人地粮关系普遍呈现了“人增—地减—粮紧”的窘境。尽管二战后总的来看各国的粮食增产超过了人口增长，但是现实中人口增长和粮食供应之间的平衡却总是脆弱的。因此，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许多学者对未来人地粮的关系表示担心。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生物学家保罗·埃里奇的“人口爆炸论”、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等观点成为那个时期谈论人地粮关系的悲观代表。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进入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粮食安全在20世纪90年代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他认为，中国的崛起正在消费掉全球的粮食供给；而后他又指出：到2030年中国由于耕地面积减少等因素的影响，粮食有可能减产20%。如果不考虑膳食结构的改善，中国将进口相对于现实世界粮食贸易总额的粮食。布朗的观点立即引发了学界和各国政府一场围绕“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论争，而且这种论争至今还在持续着。世界银行专门进行了关于中国长期粮食安全的课题研究，其结论认为，

中国在2020年粮食需求量的90%可以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农业科研、土地和水利发展的投资而在国内生产解决，另外10%需要依靠进口。与此同时，国内学界也先后对中国粮食安全状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他们普遍认为，虽然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将是对中国乃至世界未来发展过程不容回避的问题，但是布朗的观点的确存在着诸多值得商榷之处。

人口要素对现阶段中国食物需求的影响

一方面，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由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水平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过大，加上年龄结构、城市化水平等其他人口

要素的交叉影响，人口要素对当前中国食物基本需求的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食物的基本需求量也呈逐年增长的趋势。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人口要素对食物需求的影响将是长期性的，需要全社会给予高度重视。总体上讲，人口要素对中国食物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人口数量变化在拉动食物需求中的主动作用十分明显。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数量变化成为解决食物需求增长的最重要原因。中国人口规模由1978年的9.6亿人增长到2008年的13.28亿人，30年间增幅达38.33%。如果不考虑人口结构和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那么人口的增长率将使得食物需求的变化获得一个同比例的增长，即食物的



摄影：孙伯兴

基本需求增长38.33%。

其次，在人口总量随食物需求的增长带来变化的同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为其带来了新的变化量。因为不同年龄之间要维持健康生活所需的食物量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例如，15岁以下人口的比例下降，而成年人口与老年人口比重则不断增长。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中国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3.59%；2007年这一指标下降到19.4%，25年间下降了超过14个百分点，说明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增长极快。笔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变迁中的人口年龄结构要素对食物能量基本需求的影响比例可能在7%左右。

最后，城市化水平对食物需求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方面。2008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已达到了45.68%，比改革开放之前提高了超过约20个百分点。由于城乡居民之间的食物基本需求量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反映在城乡间的经济水平、饮食结构等不同方面，还反映在各自人群从事的劳动强度的不同方面。农村居民由于从事的体力劳动强度更大，因而维持其生存与健康的食品基本需求量也相应较多，我们由此不难推断，城市化水平对中国食物需求总量的影响是负的，其影响比例大约在7%。

对中国未来食物安全的基本判断

权威机构预测结果显示，中国未来20多年人口规模仍然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并预计在本世纪30或者40年代达到15亿人峰值之后才会呈现平缓下降的趋势。因此，影响未来中国食物安全的人口要素仍然是人口总量，同时人口年龄结构、城乡结构等其他人口要素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的食物安全。

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要素变化的复杂性、多样性等因素，结合对未来食物基本需求和供给状况的趋势预测，笔者认为，未来中国人口要素对食物安全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无论从现在还是未来趋势看，在不发生极端气候事件的情况下，中国现阶段乃至未来的食物安全的总体状况基本良好。这提示我们不必对中国的食物安全问题过于忧心忡忡。但是，考虑到人口总量的稳步增长，保存一定的食物库存量，全面提高预防极端气候对粮食供给影响的能力既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

第二，食物安全本身包括总体和个体两个不同层面的含义，食物供需在总量上的平衡并不完全意味着每个个体都处于食物安全的状态之中。因为，食物资源在人群中和地区之间的分配不平衡总是存在的。因此，保障食物分配的公平性将是一个长期性的任务。

第三，相比人口年龄结构、城乡结构等要素的变化而言，中国人口规模变化将是食物需求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人口数量的大小、人口增长率的快慢将是影响未来中国食物安全的首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保持一个合理的人口规模对于实现国家食物安全将是至关重要的。

未来出路

在中国逐步融入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的今天，我们需要在国际开放大背景下审视和思考人口变化对中国食物安全的影响机理以及未来走向。笔者认为，面对快速人口变化的新形势，我们对中国食物安全的着眼点应包括：

第一，高度重视面对复杂多变人口要素背景下的中国食物安全问题，我们需要确定科学的指导思想。面对当前乃至今后人口变化对中国食物安全影响的现实与趋势，我们既不应当过度恐慌，也不能完全麻痹大意。科学的指导思想是，对于人口变化对中国食物安全的影响，要了解过去、把握现在和谋划未来。人口变化背景下的食物安全问题只要政策得当，规划合理，就可以降低其影响的风险。

第二，制定前瞻性应对食物安全的公共政策体系。食物安全应当成为公共政策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包括合理人口规模控制政策、有效的农业耕地保护政策、公平的食物分配政策等，以便从制度上确保中国人口、耕地与粮食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采取多种渠道增强全民食物安全的忧患意识。尽管目前中国食物安全并不存在高风险，但是也要加强全民粮食安全意识的教育，提倡保护耕地、节约粮食的理念。

第四，加强对人口变化与食物安全影响的前瞻性研究。人口变化与食物安全关系是动态变化的，需要加强对人口、耕地与粮食关系的动态预警研究，及时发现问题，为制定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提供依据。■